

◎ 上海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研究

忻平 等著



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的 文化生态研究

忻 平 王晓明 蔡 翔 郭长刚
王光东 陶飞亚 董丽敏 曾 军
闵冬潮 刘薇薇 罗小茗 张童心 著
黄景春 孙晓忠 曹 谦 朱 承
郭 红 肖清和 曹 峻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研究/忻平等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81118-313-9

I. ①转… II. ①忻… III. ①传统文化—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865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装帧设计 张天志 施義雯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研究

忻平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4.75 字数 455 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313-9/G·784 定价:88.00 元

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研究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B. 13 - 0102 -
07 - 002)的资助,特此致谢!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中国现当代文学”(S30101)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序



现代化、城市化与文化生态： 一个立体的观照

在本书中所使用的“转型期”有两层意思：第一，广义层面上“转型期”内涵是指从1840年中国和世界发生联系后，所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直至今天的社会历史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第二，狭义层面上的“转型期”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转折和变化，譬如“五四时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等等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包括当下新的历史时期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等等），其影响更为巨大和深刻。

“民间文化”在本书的使用中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涵：（1）“民间”是指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其文化有区别于国家主流文化的特点。（2）民间文化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区别，但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3）民间文化既然与社会文化系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那么从广义上说，民间文化又与社会日常生活发生广泛的关联。在本书中对“民间文化”概念的使用在不同的章节中其呈现的内涵可能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与“民间文化”如上所说的三个层面有关系。

现代化作为一股历史的大潮,虽不能涵盖近现代一切历史,却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与主要线索,是推动生活方式与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生态生成与演变的主要动力。

什么是现代化?论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基本内涵作为界定要素:全面开放与国际依存的加强,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非生命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持续的经济增长,各种社会组织、职业、技能的增长与专门化,普遍的科层制,人际关系由次属关系取代首属关系,社会文化向大众普及,各级水平上的新教育扩张,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转变,人口源源不断城市化的趋势,世袭集团普遍瓦解与自致性代替了先赋性,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要求变革由外在压力变为内在的呼声,价值观世俗化的趋同以及传统生活方式与内容为新的取代,等等。罗荣渠归纳为4种不同的说法^①:(1)是落后国家追赶先进的过程;(2)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3)是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统称;(4)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的改变过程。^②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动态进程,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划时代的世界性大变革过程。狭义而言,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出现了突飞猛进,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因此,以急速变化发展的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界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6页。

②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1976),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定因素显然更为恰当。^①说到底,现代化是在科技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上,人对自然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征服。M. J. 列维认为现代化的标准应是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②。赫尔伯特·罗兹曼在此意义上提出了测定现代化程度的公式:现代化程度=非生命力资源/生命力资源。“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动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的增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非生命力资源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③但是现代化又决非仅仅表现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上,这一过程必然引发一场改变人类自身类型——人口类型、人格类型、社会类型、生活类型的过程,显示出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等基本特征。因此,广义而言,现代化又是一个包括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无论是大规模的社会征服,还是某种被选择的文化传播,“都没有像现代化这样对极其普遍的人类生活起到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⑤,对现

-
- ① 这是因为现代化起源于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现代化的发展亦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前提与基础。许多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夏东元教授提出生产力经济快速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轨迹。(见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界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姜义华教授则定义为:“现代化过程,说到底,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转移到确保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基础之上,并努力使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姜义华:《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取向的分合和市场化道路的择定》,《现代与传统》,1994年第3辑。)罗荣渠教授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即现代工业生产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 ② [美] M. J.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萌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陶冶:《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职业构成的演变和三四十年代人口的经济属性再探讨》,《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 ③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 ④ [以]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 ⑤ [美] M. J.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萌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陶冶:《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职业构成的演变和三四十年代人口的经济属性再探讨》,《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代化的后来者说更是如此。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城市是什么？迄今为止，还未有一个共同的定义。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一个高密度异质人口、多种非农业职业、社会联系广泛的发达市场功能与严密的法律规范的区域；经济学家把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考察，K. 巴顿认为：“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是各种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①；地理学家则视之为人类对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改造，认为是这种改造与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②；统计学家认为：“城市是大规模的人口及独特的组织制度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聚合体”^③；而历史学家从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的视角来探测城市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④；等等，不一而足。综合各说，我们可以说：城市是一个集约人口、经济、文化、科技、建筑、交通的全息网络系统，是一个集约社会生活的全息空间，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

据研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距今 6 000 多年前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已首次出现了城市，以后各大洲也相继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并在随后的几千年时间里缓慢发展演变。标志着城市发展骤然提速的城市化运动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社会生活的主体由乡村向城市转化；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日趋增大，质量日渐提高；城市性质也随之由政治、军事、宗教型向工商、贸易经济型转化，城市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迅速赶上并超过了第一产业，占据了国民经济重要地位，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隗瀛涛称“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

① [英] K. J. 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2 页。

② 左大康：《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672 页。

③ William Petersen, Renee Petersen.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 Terms, Concepts, and Institutions*. Greenwood Press, 1986, p. 961.

④ 廖跃文：《城市 and 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回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显示社会生活进步与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过程”^①。可以说，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互生共长。

“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②斯本格勒的这段话，描绘了城市与人类文化与重要关系。尤其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开启，人类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迁。

文化自身的状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它诞生早期主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其后开始关注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并认为这种关联性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因此文化生态被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以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挑战为发端，欧洲开启了世俗化的历史历程，世俗文化由此走向昌明，这是西方工业革命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文化支撑。另一方面，欧洲宗教改革也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发生，由此形成的新教伦理也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力量。^③经过数百年时间的发展演进，西方国家的文化生态已经形成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局面。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被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兜售。

二

现代化的进程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波浪式地推进的。现代化理论根

① 隗瀛涛：《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② [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

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启动方式、发展先后和程度差异,分为现代化的先进者与后来者两种类型,也有称之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一般称发源于18、19世纪较早跨入现代化行列的西欧、北美诸国为先行者,而以大潮冲击下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为后来者。^①现代化的先行者是在自身基础上由传统社会内部直接产生出现代化的动力,并由此驱动而直升到现代社会中去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以海外殖民、掠夺贸易与侵略战争,借助别国的资源才得以完成。而现代化的后来者则是在外来的强加与影响下为谋生存与发展而起步的,因此,除缺乏可直接转换的技术、价值、物质、社会资源外,在现代化发展的速率与绝对比值方面与先行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尤为严重的是面临着与先行者完全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转型——社会一致认同的匮乏与先行者的压迫、剥夺和竞争压力的干扰这两个严峻的现实课题。其脱胎换骨付出的的社会代价远较前者为大,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有着共同的规律性,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化模式并不类同,列维提出了现代化后来者必须重视的三条原则:(1)“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非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2)“先行者的先决条件并不必然是后来者的先决条

① 其实,这种区分只是粗糙的,真正内生型的首批先行者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应算第二批,其启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外诱,但其进入现代化国家后,很快拉开了差距,与后来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也将它们列入先行者行列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比较现代化理论奠基人布莱克将世界各国现代化分为七类:第一类:英、法;第二类:美、加、澳、新;第三类:西欧、北欧和东欧各国;第四类:拉丁美洲各国;第五类:苏、日、中、土各国;第六类:亚洲大部 and 北非部分国家、英属西印度群岛等;第七类:中非、南非国家和少数亚洲国家。排列越前,现代化启动越早,现代化程度愈高。布氏这种排列以其理论为标准,如主要以社会结构和政治现代化程度,经济增长居次。尽管如此,先行者与后来者区分还是比较清楚的。(参见:《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国现代化理论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则分称为现代化的“先行国”、“后进国”、“迟到国”三大类。(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件”；(3) “一个后来者的国家的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未必是另一个后来者国家的先决条件”^①。除主观选择决策外，客观条件的制约彰显得格外鲜明。

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这种客观条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外铄性挑战与现代化大潮的冲击影响——1840年以后的现代化发展正是源于这一启动力。二是特殊的国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陆与沿海各地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方面千差万别，极不平衡。悠久的历史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无断裂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内部早已蕴含着异质变量要素，只是因为王朝轮回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而难以突破。当外来文明刺破这一传统共同体并注入新的要素后，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数不清的难题，也激活了内部原先的异质要素，促发了新的社会发展动力产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中外融合的变异特征，显现出浓烈的中国特色。

而发展不平衡表现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各个层面上，从发展类型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动的依附型现代化向自主的赶超型现代化逐步升级的过程；从发展的主体来看，是由少数前卫派先锋人士逐渐汇集成精英集团，进而由新兴的阶层、阶级的认同与行为渐次推向全社会、全民族的过程；从其外延内涵而言，是引进学习与表层的器物模仿向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根本变革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中，缓慢渐进的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变化是一个极为重要又常为人忽视的中介点；从时间轨迹来看，中国现代化经历了多次风云变幻，呈现出大起大落而又未间断的坎坷曲折的发展曲线；而在空间地域上，则是由点（上海等少数通商口岸）经线（东南沿江沿海地区）到面（由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分层梯度推进的过程。^② 西方学者施坚雅、费正清、柯文运用分层理论的研究亦已得出

^① [美] M.J.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萌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② 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大致相同的结论。^①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如影随形,与现代化呈现出明显的共同发展的轨迹。

中国城市发源甚早,据考证,早在6 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姜寨部落已开始筑城,距今4 000多年前的夏朝,城市数量与质量已相当可观。^②中国早期的城与市是两个概念,城指围有高墙深壕的军事防卫据点,市为贸易市场。后随社会生活的发展,两者渐趋合一,融为一体。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宋代,三是近代。秦统一前,全国已有540座城市,截至唐末已达1 000多座。从宋至元明新建了400多座,并出现了长安、开封与临安等3个可称为特大型的城市。美国城市史学家钱德勒称之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③宁越敏认为与第一次高峰相比,无论从城市空间结构、居民人数、社会功能及城市生活来看,都可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使中国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④

184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随现代化进程无疑是更具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在数量上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展,而且在结构、功能、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以前有了本质的区别,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的浪潮。但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踉跄步伐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比较缓慢。根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对近代中国的城市及人口所作的定量分析,1843年中国超过2 000人的城镇有1 653个,城镇人

①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第一部,“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42页。

② 钟荣魁:《城市化——人类生活的大趋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③ Tertius Chandl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An Historical Census*. Lewiston: St. David's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宁越敏:《论宋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华东师大城市和区域开发研究中心编:《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口为2 072万人,在总人口40 500万中占5.1%。到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增至2 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至6%。至1949年,城镇人口增至5 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增至10.6%。^①也就是说,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个百分点的增长。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时间,中国开始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城市人口加快增长,但由于总人口的快速增长,城镇化率增速被大大稀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飞速发展,相应的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0年的46.59%。进入21世纪后更是以每年0.9%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我们再把一百多年来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比例的消长变化拿来比照,更可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也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

近代以来,以现代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的文化生态同样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中国的文化生态的主要特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与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民间文化的并立,也即学界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②在古代中国,从秦汉以来,尤其是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人们普遍认同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文化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的核心内容。相映成趣的是笼罩在全国性的民间文化生态下的地方民间文化。其中的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表象的差异和地方个性因自然山水、道路阻隔、物产丰衰、农业工商、区域人格和地方民性显现得格外清晰,无论是地方方言、民间俗尚、生活形式、耕作习惯、文化教育等无不显示出各地的差异性之大,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是,各地民众所共同服膺的价值观、文化观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却是大致相近的。

① 参见黄仕诚：《城市建设经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

②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分法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后来欧洲学界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概念来替换它。



随着近代社会大幕的开启,以及由之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西方的入侵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现代化造就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之分;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又制造了城乡文化的分野;而随着以现代化、城市化为基础的商业化、世俗化的发展,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结构也逐渐得以显现;同时,随着全球化的逼近,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并存也日益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事实。

学界在观察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时,更习惯将其划分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类型。^①在整个转型期,中国文化生态的内部格局有失衡倾向,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比例动态失调。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打破和新型结构未臻完善,大众文化的过度庸俗化和娱乐化以及精英文化的缺失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匮乏,功利主义盛行。造成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信仰失落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已足以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一个以文化宽松、文化繁荣为指向和背景,以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以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为支撑的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系统在不断整合中日趋形成,不断完善,这不仅使其自身更具内凝能力,也定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间活力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始终都在扮演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其兴衰荣辱无不折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

^① 马菁:《近十年来国内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综述》,《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从 1843 年开埠到今天,上海的社会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 1843 年开埠到 1949 年为第一阶段。它是上海现代转型的开启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海得风气之先,从一个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具现代性的城市。无论从行政建制上还是从生产、生活方式上,都实现了从传统城镇到现代都市的革命性转变。这一阶段的顶峰是 1927—1937 年。第一阶段经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吐故纳新奠定了基础,新的生活方式大幅度涌现。这一切,均为 20—30 年代上海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各地人才与物资源源不断受吸纳而向上海集中,上海的生产力以跳跃的步伐前进,一个作为现代化中坚力量与内在动力群的包括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在内的新上海市民群体已然形成,新的社会生活已成为上海生活的主导趋势,以利为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已为社会基本认同,新的社会、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型人格的上海人,各种新型社会中间组织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行会为主的经济集团而成为独特的民间整合系统……这一切,均表明了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已达到一个历史的顶峰时期。就现代性而言,无论与历史上还是与全国各地作坐标系的纵横参照比较,都堪称最为成熟,最为典型。

然而,即使在其黄金时期,上海也远未成为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传统社会仍未消失,从而使社会生活凸现出一种多元势差结构。进一步说,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上海的繁荣属于半殖民地经济下的畸形繁荣,其兴衰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

第二个阶段为 1949—1978 年,在这一阶段,上海迅速从一个商业型、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1952 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占 52.4%,第三产业仅占 41.7%;到 1978 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为 77.4%,第三产业仅占 18.6%。数字的背后是饭店、宾馆和舞厅的纷纷